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施特劳斯(Leo Strauss) ● 著

#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

## ——《齐家》义疏

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economicus*

杜 佳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

——《齐家》义疏

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economicus*

[美]施特劳斯(Leo Strauss) ● 著

杜 佳 ● 译 程志敏 张爽 ● 校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美)施特劳斯著;杜佳译;程志敏、张爽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经典与解释 施特劳斯集)  
ISBN 978-7-5617-5962-2  
I. 色… II. ①施…②杜…③程…④张… III. 施特劳斯(1899~1973)—政治哲学—哲学思想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515 号



### 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economicus"

By Leo Straus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70 by Cornell University; copyright renewed 1998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246 号

施特劳斯集

###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

(美)施特劳斯 著  
杜佳 译 程志敏 张爽 校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特约编辑 刘丽霞  
封面设计 童贇贇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75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962-2/B·414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缘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遴选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容易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年

## 中译本前言

据说色诺芬的著作不好读，因为太平实；或者说太好读，反而更不好把握，看似平淡的地方可能都充满玄机，但又让人捉摸不到，还容易大而化之地略过。实际上，施特劳斯的书也是这样，行文平铺直叙，用词普通平常，结构简单明了，甚至长篇大段地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读起来寡淡如水，这与德国两百多年来形成的思辨深沉的艰涩文风大不相同。其内容也多半是解读或疏释别人的作品，甚至是解读别人对古典作品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解释”便有如柏拉图所讽刺的“模仿的模仿”，离思想的“原型”似乎很遥远，在一个毫没来由动辄强调“原创”的时代，的确了无新意。

施特劳斯在本书引言一开始就告诉读者，也许我们对色诺芬的理解有很大偏差——这在施特劳斯晚期的作品中越来越不常见，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则完全不谈文本之外的大话题。在施特劳斯看来，色诺芬并不是“头脑简单、才智有限、平平庸庸”，那么他为什么要故意如此写作？施特劳斯自己也不是简单地复述别人已有的思想，他说，“对一个不是啰里啰唆的好作家来说，重复决不仅仅是一种重复，而且也很少是一种逐字逐句的



重复；对一个好作家来说，重复常常教会我们一些在第一次陈述中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这不仅是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评述，实际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施特劳斯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言”方式。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施特劳斯对这位伟大的作家情有独钟的原因。借用一个佛家譬喻，“行止坐卧，无异常人”。

正如书名所示，施特劳斯想通过色诺芬来理解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但苏格拉底“侃”而不作，我们只有通过色诺芬等少数几个作家才能对这位从云中莅临的政治哲学始祖有所了解，尤其重要的是，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记载别有一番气象，因此色诺芬“这位如今被人们忽略并轻视的作家，是我们理解政治事物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布鲁姆语）色诺芬这本讲述家长里短的书，就成了一部政治哲学的重要著作，道理很简单，齐家有如治国，同时也是治国的基础，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个词用于诸神对整个宇宙的管理”。

施特劳斯开篇就说：“政治哲学的伟大传统源于苏格拉底”，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观点，较为特别的是，他在这里用首字大写的形式突出强调了“伟大传统”。这是施特劳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果，用布鲁姆的话说，施特劳斯差不多有二十年没有再触及这个话题，而从他的讲课和研究来看，他当然一直都在关注色诺芬，因为色诺芬在施特劳斯那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把色诺芬看成了一个理解古典思想的重要通道，而这个通道不幸被埋藏了千年之久——人们至多把色诺芬看成一个笔调朴实甚于不知取舍的历史学家。

在施特劳斯明白而不失弹性的叙述中，政治哲学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它也有着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肇始于苏格拉底，来自于苏格拉底，也由苏格拉底所造就——施特劳斯在这里故意用了一个表示行为者的介词 by[这在与 originaged(开始、发源)

的搭配中并不常见],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仅)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from),而是被苏格拉底首创的(这让人想起上帝的创世,参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1卷第23章)。

施特劳斯如此强调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用意恐怕不仅仅是同尼采角力,而更多是要纠正我们这个时代无法遏制的自高自大,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空虚无根。如何造就一个贤人、君子、治国者,如何塑造城邦的子民(比如农夫、匠人、士兵),如何把男性培养成男人、把女性培养成女人,诸如此类的老问题,在现代似乎有了十分迫切的需要。当然,施特劳斯也许没有这么死板的先行主题,但他强调说在我们对色诺芬的反反复复阅读中,总会对自己的时代有所发现,那么,细腻解读背后总有着宏大的关怀——这还是我们目前没有学会的技巧、态度和“运思”方式。

这本书十分简朴,但双重难读:色诺芬的写法已不易把握,施特劳斯的“色诺芬”式的解读更难把握。由此,读者不难想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窘迫。如此简约而睿智的著作,也许不仅对译者的心性、气质有所要求,译者的年龄甚至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本书译者和编校者实在不敢自称具备这些条件,好在我们都尽到了自己的绵薄之力。译作一定还存在诸多问题,盼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本书前半部分(即色诺芬的《齐家》)本身就是英译文,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就径直从这个版本译出(另参考了张伯健、陆大年译本,即《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1961年版)。注释中的希腊文,由于当时排印条件的限制,都用拉丁字母代替,在我们的译本中,则由喻娟同志据希腊文本复写回原文。

程志敏

2007年12月于慕尼黑大学哲学系

## 1970 年版前言

布鲁姆

对这一话题沉默二十多年后，施特劳斯又回到对色诺芬的研究，这一举动表明了他的观点：这位如今被人们忽略并轻视的作家，是我们理解政治事务，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施特劳斯影响深远的早期作品《论僭政》(*On Tyranny*，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8 年再版)讨论的是一篇苏格拉底没有在其中出现的对话(《希耶罗》[*Hiero*])。那部作品暗示，色诺芬思想中关于苏格拉底的方面需要补充论述，而本书致力于解释的，正是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清晰描述。这是对理解苏格拉底真正教诲的重要贡献，对我们理解政治学问的起源和意义及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至关重要。这篇对话为我们勾勒出苏格拉底这位哲人与他的朋友之间微妙的关系。

为使读者能够紧跟施特劳斯教授对文本所作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本书收入了罗德(Carnes Lord)全新直译的《齐家》(*Oeconomicus*)。施特劳斯教授渊博的学识孜孜以求的，是要重新揭示作为知识和灵感来源的文本；这也意味着，敬重

作者深心写就的作品，尽管这样的敬重如今并不占主导地位。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典范。

巴黎,1970年2月

## 1998 年版前言

布吕尔(Christopher Bruell)

[ix]圣奥古斯丁出版社(St. Augustine's Press)此次刊印施特劳斯最后两部论色诺芬的著作的平装版,向新一代学子介绍了施特劳斯有生之年出版的最后两部著作。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首次问世以来,这两部作品就让好几代读者困惑不已。它们对其读者有极高的要求,需要读者严谨认真、机敏小心、全神贯注,还要富有耐性、持之以恒;实际上,施特劳斯所有的作品都要求如上品性。然而,即使对施特劳斯的作品业已熟悉的读者,或者尤其是这样的读者,当他们在这两部著作中接触施特劳斯更为慎言克制,或可说是惜墨如金、举重若轻的风格时,即便不是大为困惑,也常常惊讶不已,虽然如此文风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并非前所未见,但较之以前,这两部书中的风格却显得更沁透文脉。因此,人们会更为惊奇地发现,施特劳斯在生前最后一年写给他大为敬重的一位学者的信中,他自认这两本书是自己最好的两部作品:

很高兴您已收到我那两本书,我在其中论述了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它们并非我最后写下的东西,

但我相信它们是我最好的作品；您可能会对其中一部分感兴趣。这两本书虽未直接挑明(eo nomine)，却相当详细地阐发了我在《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第61页就苏格拉底和《圣经》之间差别而透露的看法。<sup>①</sup>

然而，这同样也意味着，倘若我们[x]思考施特劳斯在给肖勒姆(Scholem)的信中对自己两本书的评价，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本书——即便施特劳斯没有用别的什么方式来阐释，在此，他对我们注意到的费解之处，已稍稍指点了一些迷津。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本著作所显示出的特点和意图，能否让我们更明白施特劳斯对它们的评价。这两本书研究了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的四部作品。其中的第二本，即《色诺芬的苏格拉底》(*Xenophon's Socrates*)，探讨了这四部作品中的三部，其中包括最长的一部，但该书却没有“导言”(Introduction)，只有一个很简短的“前言”(Preface)。(这篇“前言”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本书中，施特劳斯重复了自己“在早些时候出版的作品中<sup>②</sup>有必要提出的”“某些要点”。施特劳斯请“注意到这些重复的读者”体谅他。我们可以推断，施特劳斯就是为这样的读者而写，并且在“前言”中提醒他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二本书会在某个或某些重要的方面，证实第一本书中的说法。这样的推断恰如其分，因为施特劳斯用第一本书专门研究色诺芬

① 1972年11月17日写给肖勒姆的信；另参1972年9月6日写给此人的信。施特劳斯，《施特劳斯文集》，卷三，Heinrich和Wiebke Meier编(Stuttgart/Weimar: J. B. Metzler 2001)，页764—65，以及762。[中译编者按]中译见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北京：华夏版2006，页473。

② [译按]指《齐家》。

四篇苏格拉底作品中的一篇，他似乎认为这篇作品“最发人深省，同时却最容易被误读”。)施特劳斯没有给第二本书写“导言”，但他给第一本书——《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所写的“导言”，可以被视为这两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的引言。但是，那篇“导言”本身相当简短，只有八个段落，而且宣告这两本书的主题的任务，只是分配给了其中的一段。(其他七个段落则致力说明，为什么关注那个主题的人有理由求助于色诺芬，之后，通过说明第一本书要论述的独特之处和重要性，逐一区分色诺芬的四部苏格拉底作品。)这一段才是这本书的开头，其内容如下：

[xi]政治哲学的伟大传统源于苏格拉底。

据说，为了让自己完全致力于对伦理问题的研究，苏格拉底全然漠视“自然”整体。他的理由似乎是这样的：人们并非一定需要了解万物的本性，但他必须得关心如何过个人和集体的生活。

这个段落作为施特劳斯的一部作品或者两部作品的导言，其不同寻常之处，只能通过全面比较施特劳斯其他每本书的开头方式，才能做出恰当判断。然而，对目前的意图而言，浏览一下另一部著作的“导言”或已足够。即使从时间上来说不是最近的，这部著作在精神实质和主题上，与这两部关于色诺芬的作品最为接近——其实在时间上也最近，如果我们只考虑作品最初成书的时间，不包括文集在内的话。《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导言”的第一段内容如下：

我们伟大的传统包括政治哲学，这本身似乎就保

证了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根据这同一个传统来看,是苏格拉底创立了政治哲学。

对比这两个开头的段落,其相似性立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旋即两者深刻的差别也让我们感到惊奇。在解读色诺芬那部作品的导言中,施特劳斯不再为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寻找外在的根据(无论传统中还是别处的)。他也没有为返回政治哲学的源头——回到苏格拉底那里——提出正当的理由,就如他在《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的导言中稍后部分所做的那样:

我们所概述的苏格拉底问题……[xii]只是尼采陈述的“苏格拉底问题”的一个铺垫:尼采说,苏格拉底代表什么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东西的价值这一问题。换言之,返回到伟大传统的源头变得尤为必要,因为那种传统已遭到彻底质疑……

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一书的导言中,施特劳斯几乎是顺便为之的一句评论,可为上述导言的对应之语:

在与人相关的每件事上,我们的时代自诩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更为开明,但这个时代却显然对色诺芬的伟大视而不见。即便不是刻意为之,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一读再读色诺芬,对我们的时代有所发现。

换言之,应该受到讯问的(这种不当的法庭即使不由“我们



的时代”组成,也属于“我们的时代”)不是苏格拉底或者政治哲学;我们询问的对象恰恰应是“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依然有心关注,那么我们能够(从经典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洞见)对之做出恰当评判。施特劳斯不再诉诸于其研究密切关注着我们切身境况的根基来为自己辩护(这种做法甚至在《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中也依然可见其踪迹)。施特劳斯暗示,在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书中,他要比自己过去所允许的走得更远(因为施特劳斯同样“不愿让智慧与节制相互分离”(参见《色诺芬的苏格拉底》,页 78)——他按照其本来面目或显露出的面目,展示了他心目中的最高主题。

不过,在认定这两本书是自己最好的作品时,施特劳斯想的不仅仅是它们的主题和观点,也考虑到论述方式。那么,当尽可能按照其本来面目或所显露出的面目来表现哲学生活时,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必要的或适当[xiii]的呢?由于施特劳斯选择了通过论述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这一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可以假定,施特劳斯也认为,在这个方面,色诺芬和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堪为典范。因此,他先指出,在“一场会饮酒兴正酣之际,最适合坦率直言(parrhesia, outspokenness)之时”,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提到某些“‘自然学的’(physiological)问题”,这些问题正属于苏格拉底“主要关注”的领域(《色诺芬的苏格拉底》,页 8)。随后,施特劳斯疏解道:

他(苏格拉底)的智慧的“自然学”部分,不仅如此,还有他整个的智慧,只能在“玩笑”中,才能毫无伪装地表现出来;智慧与笑声之间的联系太紧密了。(《色诺芬的苏格拉底》,页 170;另参页 92)<sup>①</sup>

---

<sup>①</sup> [中译编者按]此段引文系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会饮》义疏,中译见刘小枫编,《色诺芬的〈会饮〉》,北京:华夏版 2006,页 248。